

何以身體？何種政治？

——評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

● 樂兆星



深町英夫：《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北京：三聯書店，2017）。

一 導言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內憂外患阻礙着現代國家建設的順利進行。在此情境下，1934年2月

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以下簡稱「新運」）。這場運動最鮮明的特點是以復興中國古代固有道德即「禮義廉恥」為內容，進行生活革命，使國民依照「禮義廉恥」的德性而生活。新運官方指導文件《新生活運動綱要》所附的〈新生活須知〉，除對禮、義、廉、恥的意涵分別加以闡釋外，還對國民的衣、食、住、行作了詳細的道德要求^①。新運最初以「規矩」、「清潔」為主要目標，其後，進一步擴展到「三化」運動，即「生活軍事化」、「生活生產化」、「生活藝術化」。此後，新運受到中央和地方的高度重視，從南昌一隅擴展到全國，席捲了大部分區域，影響了各種職業群體，迅速成為一項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新運服務於抗戰事業，演變為一個與戰地服務、難民救濟、傷兵慰問、保育童嬰、徵募物品等戰時支援有關的運動。抗戰勝利後，國共內戰爆發，國民黨政權在戰爭中節節敗退，無力兼顧新運，以致運動的實踐愈來愈少，最後名存實亡。至國民黨結束在大陸的統治為止，新

1934年蔣介石在南昌發起「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以復興中國古代固有道德為內容，進行生活革命，迅速成為一項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新運持續了十五年之久，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覆蓋了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深町英夫基於身體史研究的視角，全面展現了新運異彩紛呈的畫面。本書所研究的人物相當廣泛和多元；研究主題涵蓋了思想、政治、社會、軍事等多個層面；研究區域不僅受限於南昌一隅，而且包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

運持續了十五年之久，不僅持續時間長，而且覆蓋了國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與共產黨經常嫻熟地開展群眾運動相比，國民黨發動的群眾動員可謂極少。那麼，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為何會發動如此大規模的新運？這場運動是如何展開的？又留下了哪些未竟的歷史課題？在既有研究新運的專著中，關志鋼的《新生活運動研究》對新運的基本理論、組織與人事等作了論述，並系統考察了運動推行的歷史全過程^②。溫波的《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運動研究（1934-1935）》聚焦於在南昌展開的新運。他認為新運是一場救亡救國的民族復興運動，被蔣介石用來重建新政權的合法性基礎^③。此書中的「合法性」是指人們對統治存在之意義所形成的一種普遍信仰、普遍信任和普遍認同。王曉華的《「模範」南昌：新生活運動策源地》選取了大量有關南昌新運的老照片，圖文並茂地展現了這一場大規模政治風暴中的發動者、運動者和被運動者。此書認為新運的真正目的是整齊劃一地控制國民的思想和行動，以便更好地維護和鞏固蔣介石的獨裁統治^④。段瑞聰的《蔣介石與新生活運動》則系統地研究了新運發起初期以及抗戰時期的組織構造與蔣介石權力之基礎的建立和滲透，反映了蔣介石近代國家建設的理念^⑤。

然而，上述著作有的關注宏觀問題，寫法比較中規中矩，讀起來難免枯燥乏味；有的只關注短暫的時間段，研究地域僅限於南昌一隅，從而不能完整地呈現出運動發展的歷程；有的側重於探討新運中

蔣介石權力的生成和變化及其國家建設的理念，缺少對新運中底層人物態度和觀念的探討。由此，關於新運的研究，有待學者以獨特的、全新的視角去探索和開拓。

日本學者深町英夫為系統研究新運作出了多重的努力。2017年，他親自把自己於2013年用日文寫就的著作《教養身體的政治：中國國民黨的新生活運動》（引用只註頁碼）翻譯成中文出版^⑥。與上述研究專著相比，深町英夫基於身體史研究的視角，全面展現了新運異彩紛呈的畫面。以此視角出發，本書所研究的人物相當廣泛和多元；研究主題涵蓋了思想、政治、社會、軍事等多個層面；研究區域不僅受限於南昌一隅，而且包括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互動。本書如講故事般娓娓道來，又不失學理性，不僅研究內容非常廣泛，研究視角頗為新穎，而且研究主旨融貫始終。

作者在〈後記〉中提到，之所以研究新運，是因為在哈佛大學留學期間，看到古色古香的《新生活掛畫》上的標語時，產生了一種不可思議的「既視感」。這些標語與他在二十世紀80年代於中國旅行時所看到的標語非常類似（頁294）。這似乎表明，歷史雖歷經滄海桑田，但仍有其連續性，新運所力圖達致的目標在後革命年代的中國仍未完成。本書的〈序章〉表達了一個既簡單又根本性的疑問：「國民黨政權何故發動並持續了這種略帶膚淺、瑣碎之嫌的啟蒙運動？而且，它何以發展成為如此大規模的全國性群眾運動？」簡言之，「國民黨政權何故且如何企圖介入、干預中國人民的日常生活？」（頁3-4）